

特稿 54

他们算是90后中的少数派吗?对世界充满好奇,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勇于探索自身的潜能和未知的明天。
即便是少数派,这些90后传递的依然是社会需要的主流声音——通过做公益建立起与这个世界的某种联系,真切地感知社会温度,向更多人传递善意,让自己内心快乐。

照亮年轻的自己

■本报记者 蒋蕊



张介然(左二)的幸福面包公益,为流浪狗找到了口粮。



郭咏(前排左二)和他支教的孩子们在一起。

20

岁出头的年轻人都在忙什么?是为了考研、留学而埋头书堆,还是为了车子、房子在辛苦攒钱?在这个秋去冬来的时节,倾听三个90后与公益结缘的故事,也许你会如沐春风。他们想要的,是“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郭咏 善行的种子 在心底

小时候的事情很多都忘了,而奶奶的那一句话,让郭咏牢记到今天。家门口来了乞丐,奶奶总会给个馒头。其实家里很穷,自己都舍不得吃,小郭咏心疼得哇哇大哭。奶奶告诉他:“你少吃一个,大不了吃不饱。乞丐少吃一顿,说不定就饿死了。”郭咏一直觉得,是奶奶最早在他心底播下了善行的种子。

在很多人看来,郭咏才是那个更应该被帮助的人——1990年出生在山西临汾一个贫困的村庄;1岁失去了父母,与奶奶相依为命;12岁外出打工,筹措自己的学费。

然而,郭咏却帮助了那么多人——12岁,帮助艾滋病携带者;15岁,资助上不起学的孩子;16岁,发动身边同学帮助肢体残疾人士学习上网;18岁,成立北京公益联盟,向孤寡老人、临终患者、孤儿和身心障碍者提供帮助,志愿者已经突破20万人。

“我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所以我会更投入地帮助他们,我也更容易走进他们的内心。”24岁的郭咏脸庞黝黑,透着远大于他年龄的成熟,还有些许疲惫。

小时候,因为交不出一年的90元的书本费,郭咏上不起学,只好偷偷躲到课桌下听课。学校就是一间破窑洞,照明要靠课桌上的蜡烛,蜡油滴到头上,他本能地惊叫着跳了起来,被赶出了教室。后来,他就蹲在窑洞外听课。直到9岁,他才终于走进课堂。

刚进学校,穿得又脏又破的郭咏总是一个人,因为没人愿意跟他一起玩,一天说不了几句话。没有朋友,没有笑容,甚至没有表情。“被排斥的感觉很难受,但你是个男孩子,而且没有爸爸妈妈可以倾诉,所以就忍着,不哭出来。”

后来,这个孤独的孩子遇到了一群更孤独的孩子。

12岁的郭咏利用假期跑到工地上当搬运工。附近有个学校,里面的孩子见到生人就触电一般躲开。原

来,他们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被老师要求必须跟别人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

郭咏去到其中一个孩子家里。孩子的母亲因为艾滋病去世了,父亲、爷爷、奶奶都不跟他同桌吃饭同屋睡觉,“就像养牛马一样,喂完食物就关进棚子”。

自小失去双亲的郭咏,知道没有父母疼爱的痛。两天里,他白天跟孩子一起吃晚饭,晚上跟孩子睡在一张床上睡觉。看着郭咏的举动,父亲终于让孩子上桌吃饭了。

郭咏的奶奶全身瘫痪,一直想上北京看看天安门。2008年,郭咏到北京读大学,本想安顿好了,就把奶奶接来。没想到,奶奶很快去世了,未竟的心愿成了郭咏一生的遗憾。

一次,郭咏听到一位残疾老人说:“我坐轮椅大半辈子了,虽然生活在北京,但从没去过故宫,没上过长城。”于是,他去了4次故宫和两次长城,绘出轮椅路线图。随后,他和志愿者们陪着33名残疾人参观了故宫,又将30多名坐轮椅的残疾人抬上了长城。

长城之上,一位老婆婆拉着志愿者的手哭了:“如果不是身体不方便,我真想给你们磕个头。以前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今天实现了。”

那一刻,郭咏仿佛看见了奶奶的笑容。“我们也是受助者,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了快乐。”

大学第一天,郭咏看到有公益社团在招募志愿者,兴冲冲地跑去报名,却发现需要捐50元。“贫穷就不能做公益了吗?”

2008年9月28日,郭咏创办了北京公益联盟,倡导零捐款,希望拆掉做公益的门槛,让更多人投身其中。

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距离。做公益活动不仅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有些时候还是离不开钱。于是,靠助学贷款上大学的郭咏,艰难地兑现着让参与者“零捐款”的诺言。为了赚钱,他当过清洁工、促销员、保安和文案制作,每天下课后都要工作四五个小时。

2012年,郭咏大学毕业,顺利入职一家报社,却发现自己的工资没法支撑公益联盟的运转。他辞职了,成立了一个电视制作工作室,用挣的钱继续给公益活动“输血”。

现在,公益联盟的办公地点由朋友免费提供。但是,3名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和组织活动的开销,都要由郭咏承担。他还资助着12个孩子上学,每年共3.6万元。

“省己助人,在别人看来是很愚蠢的事情,但是,那些聋儿过了最利于康复的时间,就会一辈子生活在无声世界里;那些老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时候没有登上长城,就会留下一辈子的遗憾。我只是现在苦了一点,以后有大把的时间去享受生活。”郭咏的话实在而豪迈,“如果我一个人的‘傻’能影响北京公益联盟这20万人爱上公益,如果他们用实际行动让更多的人知道人人公

益,随时随地公益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我就觉得值了。”

渐渐改变的是,郭咏开始更现实地思考自己的公益之路。

毕竟,凭借一腔热忱坚持的零捐款原则,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现实考验——随着联盟规模扩大,活动增多,仅靠一己之力来支撑越来越难。目前,郭咏正跟专业人士加紧进行组织内部相关制度的完善,北京公益联盟有望在明年开始接受捐款。

告别“零捐赠”,对郭咏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它好像是在告别昨天的自己,告别那个被理想主义的光环感召的自己。

但是,做干干净净的公益,这份坚守不会改变。郭咏记着一位民政部官员对他说的话:“你的公益做得比你的脸还干净,一定要保持下去。”



刘思宇希望有更多同行者。

刘思宇 拯救搁浅沙滩 的鱼儿

“不忘初心”,很多做公益的人喜欢用这个词。

刘思宇的“初心”,是一个个难忘的眼神。

一次,刘思宇和几个志愿者去艾滋病人家中探访。这是一个几近绝

望的家庭,父亲因吸毒染病,再传染给母亲,又通过母婴传播给了女儿,把艾滋病三种主要传播方式都占全了,还被村子里的人驱离了原来的住处。

志愿者们去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母女俩住在一个昏暗潮湿的小木屋里。母亲皮包骨头地躺在床上,小女孩全身都是烫伤和淤血,因为在原来的村子里,好多人欺负这个患上艾滋病的孩子,大人拿烟头烫她,小孩拿石头砸她。

墙上贴着女孩的一幅画,在他们原来住的房前,爸爸妈妈笑盈盈地牵着她的手。

志愿者们想跟女孩聊聊,可她一直不说话,木然地沉默着。直到大伙要离开的时候,她像是鼓足了勇气突然拉住了刘思宇,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毛两毛的零钱。

小女孩说:“哥哥,你能拿这些钱去救我妈妈吗?”

刘思宇一下子愣住了。看她妈妈的情况,可能活不过三个月。

“我妈妈会死吗?”小女孩的眼神里充满期待,还有恐惧。

刘思宇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深感无力的他,牢牢记住了小女孩那一刻的眼神。

另一个女孩的眼神,也令刘思宇久久难忘。

刘思宇去四川凉山支教的时候,跟着一个女孩去做家访。整整走了两个小时的山路,很多地方都要抓着藤蔓才能上去。这让刘思宇感到一丝困惑,支教是在暑假,孩子们本来是可以不来学校听他讲课的。

实在忍不住了,刘思宇问:“你走路那么远,为什么还要来?”

女孩转过头来,睁大眼睛,认真地说:“哥哥,我想读书啊!”

女孩热切的眼神,在一瞬间击中了他。

另一个男人的眼神,也雕刻在了刘思宇的心底。

2006年,中考后的暑假,刘思宇到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进行环保宣传。在一片原始森林里,他看到一个哈尼族男人正在打猎。

远方有个影子在动,打猎者举起了枪。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刘思宇猛地站到枪口面前。

对方一愣,把刘思宇推开,又举起了枪。

刘思宇毫不退缩,又站到了他的面前。

哈尼族男人用无奈的眼神盯住刘思宇,一下子跪在那儿哭起来。“我大的孩子在县上上初中,小的孩子在读小学,如果不打猎,孩子吃什么,我们一大家子人吃什么?”

刘思宇无语了。“我意识到,保护野生动物不是那么简单的,在难以保证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下,你怎么去阻止他盗猎呢?”

“这一个活生生的人,都是在我生命中有过眼神交流和心灵接触的人,我一辈子也没法忘记。”刘思宇说。正是这些眷恋或恐惧或热切或无奈的眼神,给了这个清瘦男孩超乎想象的能量,奔跑在公益的路上。从防艾禁毒、环境保护到支农支教,忙得仿佛有三头六臂。“做这些事的人已经很少了,我要是再不做,就更没

有人做了。”

做公益10年,刘思宇拿到了各种各样的奖项,一次次被树为典型。“为什么我当了那么多公益典型?可能恰恰是因为做这些事情的人太少了。”

面对媒体,刘思宇一遍遍地讲述那些帮助别人的故事,那些如子弹般击中他的瞬间,那些在他心里挥之不去的眼神。在这个23岁的年轻人看来,“做好事不留名的时代已经过去去了,做了好事应该让更多人知道,才会有更多的人像你一样去做”。

其实,这样的道理,刘思宇还是一个中学生的的时候就意识到了。有一次,红十字会通知刘思宇去拿禁毒防艾的宣传材料。原来都是自己掏钱印,这次有了这么多免费的,他高兴地抱走了厚厚一大叠。为了省钱,他没舍得坐车,一路走回来,被沉甸甸的材料累得够呛,手还被锋利的纸边划出了一道道血口子。没有人帮助,没有人安慰,刘思宇突然感到无比沮丧与孤单,大哭了一场——“为什么我只有一个人?”

刘思宇明白了,要让更多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做这些事情的意义。于是,他主动找到媒体讲述自己的故事。从此,一根蜡烛不断点亮更多的蜡烛,他有了越来越多的同行者。

有些人做了很多年公益之后,会有种无力感,而今天的刘思宇依然一脸阳光。他爱说这样一个故事:沙滩上有很多被海浪卷到岸上的小鱼,一个男孩一条一条捡起投入海中,他不可能拯救所有的鱼儿,但每捡起一条,就多救了一条。“只要努力,就一定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一点。”

这个捡了好多“鱼儿”的男孩去年夏天大学毕业,选择了正风生水起的互联网金融行业。通过创业,他不仅比其他年轻人更快地实现了财务自由,也为做公益积蓄了更多能量。

有意思的是,公益与刘思宇所从事的众筹行业也有交集。众筹是借助众人的力量,完成某个项目的融资。公益项目所需的资金,同样可以借助这个平台去筹集。刘思宇创立的众筹平台上,就有一个叫耳目的项目,通过众包网站培训帮助残疾人找到工作。

“各行各业都可以本着公益的心态去做。”今天,这个走在创业路上的小伙子,非但没有远离公益,反而把公益之路越走越宽了。

张介然与公益结缘,是因为原本不起眼的下架面包。

两年前考进外交学院后,张介然

加入了学校的创业社团。去年初,队友们到农户家探访,发现粮价上涨让饲料成本水涨船高,农民愁眉不展。

就在那天回学校的路上,他们走进了一家面包店。一个筐里放着二三十个下架面包,正要被扔掉。队友们马上想到:如果把这些要扔掉的下架面包给鸡吃,不就能省下些饲料钱?

在他们的求助下,清华大学的农业专家对下架面包进行了检测——纯谷物面包可作为鸡饲料,营养价值高,并可保留13天至15天。

张介然开始给农场和面包房牵线,将下架面包以每斤0.2元的价格卖给农场。

可是,问题很快出现了——有些农民把下架面包拿到市场上去卖,面包店担心信誉受损,不愿意合作了。

经过一番“头脑风暴”,张介然和队友们开始尝试物物交换的模式:农场用1斤有机鸡蛋兑换20斤下架面包。“买买下架面包是在做生意,物物交换更容易建立彼此的信任。”

这种方式得到面包房和农场的认同,26家面包房和26家农场建立了合作关系。

张介然不放心,假借普通顾客去面包店回访。“你们这边每天都有过期面包下架吗?”“有啊。”“下架面包都扔了的话,也挺浪费啊!”“不会,我们这儿的下架面包都拿去养鸡场换鸡蛋了,还是有机的呢!”

这样一段对话,成了这个20岁女孩“最有成就感”的时刻。在张介然看来,“店员愿意主动跟消费者说明下架面包去哪儿了,其实已经把它作为了一个营销点,这让我发现做这件事能创造新的价值”。

不过,随着参加合作的面包店不断增加,农场对下架面包的消化能力开始跟不上了。琢磨再三,张介然想到了狗粮。他找到加工厂,将下架面包制成狗粮,卖给了流浪狗收容站。

在此之前,面包零售店下架商品的回收尚属盲区。资料显示,我国每年有60万吨烘焙产品下架,绝大部分被扔掉。

凭借被命名为“幸运面包”的这个项目,张介然和创业社团获得2014年“康师傅创新挑战赛冠军”。“下架面包找到归宿,没有浪费掉,这是面包的幸运;我遇到了它们,它们伴我一起成长,是我的幸运。”

故事尚未结束。这次比赛让张介然拿到了3万元的创业基金,幸运面包项目将在公益价值之外,继续挖掘商业价值。

眼下,张介然和其他队员正忙着筹备注册公司。“做公司不是说我们的野心有多大,而是因为项目要继续向前推进的话,必须实现规模化。”

要实现规模化,就必须联系知名连锁面包店这样的大供应商,还有那些更专业的饲料加工企业。张介然说:“只要路没有完全堵死,我们就会努力去做各种尝试。”

这个北京女孩开朗爽直,一笑露出两颗小虎牙。回想最初发现下

架面包可以回收利用的那个下午,像是一个偶然发生的故事。但正是这样的偶然,一步步地“逼”着张介然走到了她全然预想不到的地方。

幸运面包项目看似简单,真正操作起来一样费心费力,耗掉了张介然绝大部分课余时间,“连找个男朋友的时间也没有”。很多面包店老板看他们是“小孩”,根本不愿搭理谈合作。

“但做公益是要有责任感的,你会怕你放弃了就没人来做了。”在张介然眼中,“不断向前的冲劲”是做公益不可或缺的。跨过一个坎,往前走一步,再跨过一个坎,再往前走一步。“每当被卡住的时候,你都要努力开辟一条新路出来。”

创业社团的队友们还有更多的奇思妙想。比如,用废旧轮胎切割后铺成塑胶跑道,将一次性筷子生物降解变成肥料,让大学生交学费跟下岗工人学一点技术。

“公益作为一个行业正处于初步发展阶段,有很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张介然格外信奉的一点是:公益和商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都是要发现真实的需求,然后努力满足需求。不要为了公益而公益,要做理性的理想主义者。

张介然喜欢跟朋友分享这样一个比喻——地球刚开始形成的时候遍地岩石,慢慢地苔藓爬上来,等苔藓腐烂的时候就形成了土壤。

在张介然眼中,现在的公益行业就处于岩石期,她和她的同伴愿意成为那些小小的苔藓,耐住寂寞,顽强生长。

公益光芒 念念不忘 必有回响

张介然和队友们都爱穿那身深蓝色的套头衫衣服,这让他们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一眼就能认出“自己人”来。她说:“我们队友的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光芒。”

从郭咏、刘思宇到张介然,无论他们是因为怎样的机缘走上公益之路,都像滚雪球一样停不下来,并且因为遇到公益让自己变得充实而快乐。

张介然还是一位大学三年级学生,未来还有点远,有时间慢慢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今天这段为公益而忙碌的日子,“是这辈子到目前为止最美好的时光,因为她觉得‘不功利的事情做着很舒服,很自由,无关道德高度,只是把它当作青春的一部分’”。

跟着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忙碌,张介然的愉悦发自内心的:“多年以后,回想起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也许会觉得像一群疯子。但在年轻的时候,花那么多精力疯狂地去做一件自己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是幸福的。”

即便在创业之路上顺风顺水,刘思宇也没有给自己的人生定下具体的规划,他觉得不确定性才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公益会一直伴随着他。

“是公益让我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能真切地切切实实地在祖国大地上,喜欢做公益不一定要把它当作职业,它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日行一善就是公益。”今天的刘思宇,已经学会了更从容地从做公益中感受快乐。

郭咏正在从“纯理想”走进更现实的人生。转型将令北京公益联盟的发展更可持续,也可以让他卸下肩头的重担,开启一段更轻松的人生旅程。

无论未来做什么,公益早已融入他的血脉,让他从一个孤独的少年学会了拥抱这个广阔的世界。他心存感恩。

三张做公益的90后面孔背后,既有他们各自生活轨迹的烙印,也有或深或浅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新一代年轻人的特质——对世界充满好奇,不给自己的人生设限,勇于探索自身的潜能和未知的明天。

也许他们只是少数派,但这些90后所践行的正是人群中因为稀缺而弥足珍贵的一种生活方式——通过做公益建立起与这个世界的某种联系,真切地感知社会温度,向更多人传递善意,让自己内心快乐。

6年前,高中生刘思宇获得过那个叫“地球绿色少年”的国际公益奖项。这个奖项必须用英文申报,他用电脑软件翻译了生硬的英文发过去,没想到成为第一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人。

直到今天,刘思宇还记得评委的那句话:“我们在意的不是那些我们不懂的语法错误,而是从一个参差不齐的英文单词中,看到一个中国西南地区少年对于环境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所作出的努力。”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图片由报道主人公提供)